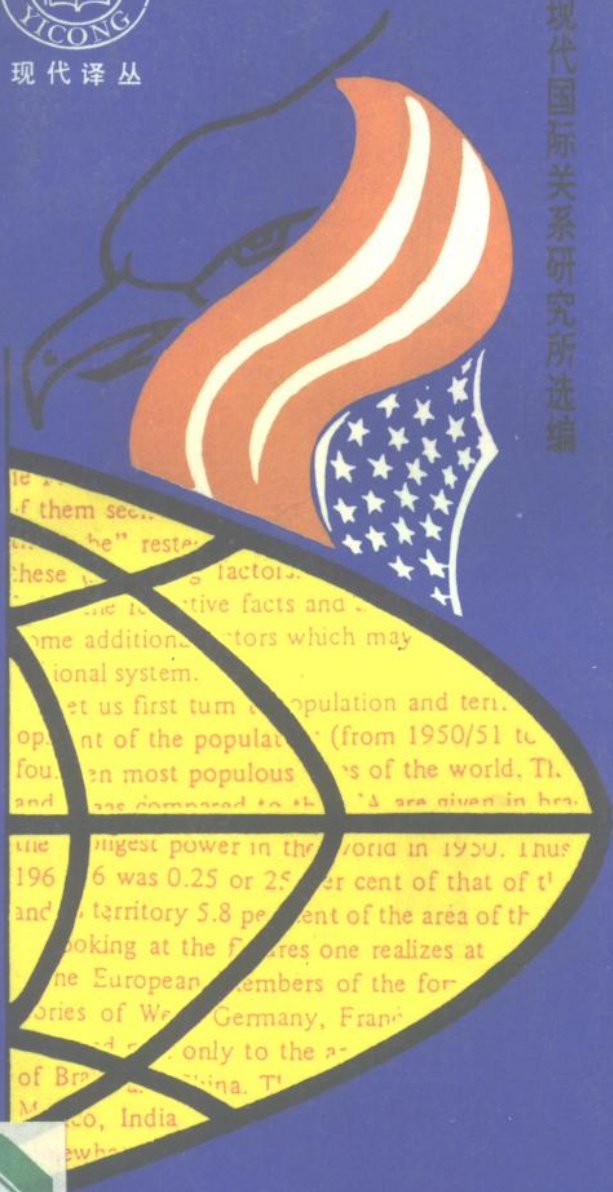




现代译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 冷战后的 美国与世界



时事出版社

现代译丛

# 冷战后的美国与世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时事出版社

**冷战后的美国与世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邮政编码:100081

北京昌平东沙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13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009-137-6/Z·13 定价: 5.20元

## 编者的话

冷战结束了。但是，世界从此安宁了吗？自诩为当今唯一超级强国的美国可以稳占世界领导地位了吗？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感到十分惶惑，国内在不断进行辩论。有的主张“不能过早放弃实力地位”，有的主张加紧推行“民主、人权”这些“理想的价值标准”，有的主张在两者之间找出“平衡之点”。犯难的是，美国在衰落，“经济陷入了危险状态”，而世界上“新的力量已不是武器和思想而是经济实力”；更有甚者，美国的新对手日本已在振振有词“要对美国说‘不’”。美国无疑需要调整外交和防务政策。怎样调整？能否调整？本辑所载美国两大重要刊物《外交季刊》和《外交政策》的主编亲自撰写的文章和其他篇章作了评析，谨介绍给广大读者比较参考。

# 目 录

---

## · 美国的战略调整 ·

美国的新方针

..... [美] 威廉·G·海兰 ( 1 )

摆脱冷战后的美国

..... [美] 查尔斯·威廉姆·梅恩斯 ( 12 )

美国在新的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 [美] 玛丽·H·库珀 ( 28 )

为什么我们会很快怀念冷战

.....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 46 )

第三世界对美国为何重要

..... [美] 斯蒂芬·R·戴维 ( 64 )

美国的非常规冲突政策和战略

..... [美] 詹姆斯·B·莫特雷 ( 93 )

关于“衰落”的错误类比

..... [美] 约瑟夫·奈依 ( 110 )

---

## · 美国的新对手 ·

敢于抨击美国的日本人

..... [美] 安德鲁·戈布尔  
詹姆斯·卡尔森 ( 127 )

---

日本人的传声筒

..... [美] 约翰·B·朱迪斯 (151)

· 冷战后的世界 ·

战争怎样改变了美国

..... [美] 查理斯·克劳特哈默 (167)

变化中的美国战略利益

..... [美] 塞缪尔·P·亨廷顿 (171)

给世界力量重下定义

..... [美] 威廉·帕夫 (186)

世界经济转变之年

..... [美] C·迈克尔·阿奥  
布鲁斯·斯托克斯 (198)

---

· 中东与海湾形势 ·

巴解组织对阿以冲突的原则立场

..... [巴勒斯坦国] 萨拉赫·哈拉夫  
(阿布·伊亚德) (241)

---

· 书摘 ·

电子计算机间谍

..... [美] 克利福德·斯托尔 (217)

## 美国的新方针

[美] 威廉·G·海兰

过去五十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针对来自对手和敌人的威胁而制订的。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几乎每一年都卷入了战争或是陷入了对抗。现在，半个世纪来美国第一次可以摆脱冷战的大部分制约和压力，重新设计自己的外交政策了。

面临这样一个转折关头，人们自然会求助于某些基本原则，作为确定新方针的主臬。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为一个弱小的共和国制定了“不卷入”这样一个基本外交原则。当时，美国处于欧洲列强的领土包围之中，而这些列强又决心要把老的斗争方式施之于这块新大陆。在那些无休止的斗争中，不卷入的方针显然是符合新生的美国利益的。在一百五十多年里，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及英国舰队）的庇护下，美国很安全。但是，珍珠港事件打破了美国的幻梦：认为只要不管远处对欧洲和亚洲的威胁，美国就能大体上平安无事。

1941年以来，美国一直卷入得很深。现在要进入新的时代了，要求美国不再卷入的呼声就可能在各种伪装下再次出现。如果冷战是结束了（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确实如此），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从过去五十年里自处的地位上脱身？美国终于能退回本土了吗？

① 本文选自美国《外交季刊》1990年春季号，作者系该季刊主编。

现在尚无明确答案。确实，现在是美国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可以自主地作出某些选择了，美国和盟国已经赢得冷战，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脱身了。严肃负责的人们并没有要求美国回到孤立主义上去。倒是右派和左派都希望大大削减美国在海外的兵力。甚至主张美国保持相当程度卷入的中间派，也同意适当收缩。

## 二

“大辩论”又开始了，很有1914~1920年间以及冷战初期那种势头。辩论的主要问题是：美国付出巨大力量和资源的目的是何在？遏制时期以后的外交政策应以何者为先？什么手段最为有效？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美国在冷战时期所承担的广泛义务，国会始终是有保留的。即使在杜鲁门总统把美国推向新国际主义的时候，也曾有过强烈的反对，尤其是温和的右派（如共和党俄勒冈州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他们不赞成美国承担这种义务，有的则坚持要严格限制这种新的义务。特别是在1950~1951年间，那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国第一批军队又回到了欧洲。但当时的辩论很快平息了，因为来自共产主义集团的威胁很明显，也很现实。

现在，来自莫斯科的危险已不再成为推动辩论的力量了。美国需要决定的是，在国家安全已经没有重大危险、也没有明显敌人的世界上，它希望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最主要的变化。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将会影响这次新的辩论。

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国际政治中明显的两极分化形势已在两个方面消失：一是两个超级大国同欧洲和亚洲若干国家的力量相比，已不再占有明显的压倒优势；二是由于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和苏联的衰弱，东西方之间的根本性分歧已基本消除，这个



变化更是出人意料。

1989年的剧变尚未终结，尤其是在欧洲，但美国政策的特征却早已由于东欧的事态而开始改变。冷战是一种内含广泛的斗争，首先强调的是地缘政治和军事准备。在冷战的初始阶段，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很少有人怀疑美国不能承担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不能重新武装北约、进行战略军备竞赛、干涉朝鲜和越南，或者，就近期而言，不能在80年代初期重整军备。然而，在今后十年内，意识形态和军事问题可能减弱，而经济因素将占主导地位，其他问题（如环境保护、恐怖主义、毒品贩运）也日趋重要。

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但是，它的力量已无法保持它战后以来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在90年代，很少有人会说美国还具有类似冷战年代那样的行动自由了。就此而言，90年代及以后的世界将与美国先前经历过的迥然不同。美国的力量有限，世界上的竞争日趋激烈，曾把各种反共的盟国联结起来的威胁行将消失，在此情况下，美国需要执行一种几乎没有先例可循的“正常”外交政策。

正是由于力量有限，而国内的种种需求又日趋紧迫，因此，美国也必须更加审慎地估计它的国际目标。在1988年，两位前总统福特和卡特曾组织一个专家小组，审查了“美国的日程表”，给当选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他们对美国国内形势是这样评论的：“我们看到了两个美国，一个日益富庶，一个可悲地贫穷；对多数人，这是机会之地，而对更多的人，则是无可作为和绝望之乡；这个国家从未如此繁荣，或者说从未如此糜费。两端之间，是中等的美国人，其中多数人正在挣扎谋生。”

当前关于“和平红利”的辩论正好反映上述内外政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始终存在，但在冷战年代，国家安全考虑应该占有上风。而现在，不同的论点有可能趋于势均力敌，因而选择也

就更加复杂。

美国自1945年以来不得不承担冷战的大部分负担以及大部分风险。在某些时期，美国领导人高兴得到行动的自由。在里根政府早期，经常听到有人指责美国推行世界主义。但现在，美国不再单干了。近来，分担责任的思想有所回潮，因为明显的是，美国的盟国多数是最富庶和强大的国家。今后十年里，单干的方针将越来越不合理，制定分担责任的办法将日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迫切任务。

### 三

那么，究竟根据什么原则去要求美国人民继续负担他们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力量均势、经济安全、人权，或者民主的自由权利？

美国历史上，在强调地缘政治和重视美国倡导的人权与民主价值这两者之间，一直是有矛盾的。冷战时期，一方面是汲汲于考虑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反共的名义而被迫作出或主动接受的勉强妥协或联盟关系会削弱美国对民主价值的传统支持。这两方面的关系经常是紧张的。人们不断指责美国把人权和民主置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之下。

随着冷战的消逝，在目标和实践之间的这种冲突还会更加尖锐。目前则反映在两场辩论上：是哪些政策赢得了冷战；关心人权和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随着东欧共产主义的剧变，正在形成两种论点。其一是说共产主义已向不可抗拒的人权要求投降，自由已经得胜，因为该它行时了。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哈韦尔说得很明白：“潮流变了。改变潮流的思想正是欧洲人（以及美国人）古老的人权思想……在其他欧洲人（以及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道

义而不是物质的支持下，这种人权思想为我们最近目睹的东欧巨大变化铺平了道路。”

另一种相反的说法是，“很明显，在东欧受禁锢的最后十年里，美国及其盟国决心比以往更坚定地反对‘另一种力量’，而苏联则决定后退。”

这场辩论不仅涉及过去，也涉及西方（和美国）下一阶段的政策，以及今后的政策方向。有些人认为，东欧的反共产主义革命，主要是由于得到美国力量的鼓舞而兴起的，因此，美国不能过早放弃实力地位。他们还说，苏联有可能（虽然不一定会）重新采取过去的扩张主义，因为苏联的外交决策同戈尔巴乔夫联系太紧，而他的国内难题又越来越多。其他一些人则认为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形势已经大变，苏联政策难以逆转，因此，提出新的日程，抛掉大部分冷战心态，现在正是时候。

尼加拉瓜的选举给这场辩论提供了新的论据。辩论的一方早就在说，是孔塔多拉集团和美国的压力迫使桑地诺派总统奥尔特加同意举行选举的，这之后他就跨了台。另一方则认为功劳应归诸于拉美诸国总统，是他们推动了和平运动和选举，给了桑地诺政权一个保留脸面的出路。

另外一场辩论很相似，但主题是中国。来势很凶猛：“中国问题再次给美国人提出了特别困难的选择：要么是选择以道义为基础的对外交政策，要么是以地缘政治因素为优先选择。中美关系又一次使现实政治和人权陷入了直接冲突。”（珍妮·J·柯克帕特里克语）

尼克松和基辛格于1972年向中国打开大门，根据的理由是建立力量均势以对付苏联，此举在美国受到了欢迎，尽管当时北京政权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然而，在1989年，冷战已基本过去，“中国牌”的价值小多了。虽然天安门事件后的这场辩论，名义上是对华政策，但根本上是一场关于美国冷战后政

策新目标的辩论。

前国务卿基辛格提出了有关地缘政治的理由：“镇压是……不可避免的。但其残酷性令人震惊，而其后的审判以及斯大林式的宣传尤其如此。然而，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此重要，以致美国不能在感情冲动时刻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去冒风险。美国需要中国，以之作为可能对付苏联在亚洲雄心的力量，美国还需要使中国在日本人心中仍然是影响亚洲事态的关键力量。”

民主党纽约州众议员索拉兹在国会辩论时提出了相反的理由：“众院和美国人民认为，中国当局尊重本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程度将影响我们同中国的关系。”

上述两场辩论中究竟哪一方正确，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美国现在是否应该调整外交政策，更加关心道义价值，即民主和人权，借以冲淡过去对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关切之情。

事实上，这种矛盾也许并不如抽象地看来那么尖锐。随着冷战的消逝，美国在地缘政治和人权两个方面的利益，在美国的政策中实际上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请考虑最近两个不相关但有启发性的例子：美国空军干预菲律宾政治支持阿基诺政府，以及美国入侵巴拿马。两者都并非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但都得到了美国公众的支持；两次行动的理由都是为了保卫民主，但不论怎么说，这两个国家又都是在美国安全利益范围内的。

促进民主是可称颂的美国雄心，但也可能成为危险的政策导向。不加节制，这种政策就可能在90年代走向干涉主义，犹如在冷战时期的反共那样，支持自我解放的东欧新的民主政权是一回事，但如在南非或伊朗等国强行民主，就是另一回事了。

还会有一些地方根本没有选择民主的可能（如目前的柬埔寨），美国仍然只好将就某些难以忍受的伙伴。美国必须决定可

在多大程度上以民主的名义插手支持反叛活动。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地区的人权很少扩大，而美国对这些地区的直接干预或者起不了作用（大部分非洲地区），或者非常危险（中国、印支半岛和中东）。

然而，当前的迹象表明，奉行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正在让位于重视人权的理想主义。这种情况，如果最终成为美国政策的新动向，也不必过于惊怪；就美国政策的根本动机而言，遏制始终是为达到人权这个理想主义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

#### 四

在冷战年代，每一届政府都很关切全球遏制战略的高昂代价。但在经济政策和国家安全两者之间发生孰先孰后的矛盾时，几乎每次都是后者占了上风。结果，在遏制政策施行了将近五十年后美国走出冷战时，经济陷入了危险状态。究竟有多大危险，可以讨论，但看来一致的看法是，“世界上新的力量既不是武器也不是思想意识，而是经济实力。”看来另外一点共识是，美国已经丧失经济霸权，要纠正新的不平衡，就必须整顿好财政。但究竟要怎样做，可惜还没有一致意见。

看来，削减预算赤字是任何一项计划的起点。而这又要引起削减防务开支的问题，因为即使少量削减开支也可以从五角大楼的预算中省下大笔的钱；有些专家估计今后几年可以削减50%。预算的削减应该反映出某种军事战略，但是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制订新的足以实现冷战后外交政策目标和优先项目的军事战略。因此，关于预算和战略的辩论在相互刺激下陷入了僵局。打破僵局的办法，在于制定新的政策，现实地估计冷战后的近期和长期威胁，并就任务和力量之间的平衡问题达成一致看法。

另一方面，贸易赤字是同日本日益加强的经济实力相联系

的。美国力图纠正贸易逆差，严重损害了美日政治关系。每一个新的技术问题都升级成为政治较量。一位观察家、美国前贸易副代表艾伦·沃尔夫说过，“贸易辩论的双方现在公开敌对了，这少说也是20年来的第一次”。危险还在于，当初是贸易问题上的小摩擦，现正发展成为有重要地缘政治影响的根本性冲突。于是，著名的日本人士指责美国有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美国重要舆论界人士则日益把日本视为敌对力量。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对日态度所以恶化，包含着两个因素：不满日本投资于高利润企业（如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担心过于依赖外国资金将使美国容易在政治和金融方面受到讹诈。

根本性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打算继续把自己的政策拴在同日本的同盟关系上。如果不是，别的办法是什么？而如果是，那就需要对美日关系中的贸易和其他方面作出新的估价。为了避免发生冲突，美日双方都迫切需要这样做。

构成国家安全的经济因素也在别的地区发生影响。由于拉美主要国家积欠了巨大债务，所以美国资力不足就影响了它对西半球的政策。财政部现行“布拉迪计划”的当前目标之一，是减轻而不是推迟偿还这些债务，也不是调整这些债务的结构。计划施行的结果，最多也是好坏参半。因为拉美重要的国家甚至还没有参加这个计划。如果该项计划失败，就有可能在美国投资者中间引起坏的影响，使他们不愿对外国提供新的投资或贷款。这也就是说，正当拉美国国家已在民主方面取得最大进展，而巴拿马也许还有尼加拉瓜正需要得到新的官方和私人资助之时，美国经济却悄悄走向闭关自守。

还有一种前景是，能源费用在今后十年内不断上涨。油价上涨和美国更加依赖海外油源，可能使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增加数十亿美元。对波斯湾石油的进一步依赖可能进一步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对以色列的态度以及向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的立

场。

最后一点是，美国发觉自己的力量几乎非常有限，无力在其他地区，尤其在东欧，发挥所希望于它的重要作用。东欧国家有可能转向德国和欧共体求取援助，使美国更加失势。

为应付这诸种经济难题，美国不论有意与否都将调整外交和防务政策。美国愿意作出多少经济上的牺牲和让步以推进自己的政策目标？或者换句话说，美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把责任转交给其他国家，相应减少自己在大片地区的影响？

## 五

并非冷战的所有问题都已有了解决办法。有些重要问题仍将是今后若干年内美国政策的核心问题。

战后以来，美国及其盟国所构筑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体系，是以同苏联的对抗没有尽头这种战略设想为基础的。为冷战后的时代积极制订政策的活动，如果说曾经起步，也很早就停止了。美国在欧洲、南朝鲜、日本和菲律宾部署大批军队，是因为设想了长期冲突。美国对伊朗、波斯湾、巴基斯坦以及中东的友邦承担义务，也是不同程度地出于同样的理由。甚至对以色列承担的具有强烈道义内容的义务，也是由于苏联在1955~1956年内插手支持纳赛尔而大为加强的。尽管美国在许多地区的驻军当初是为了对付和威慑苏联的扩张势头，但其后则由于成了地区的稳定和保证因素而逐渐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最近布什总统根据“稳定”和“可预测性”的要求，肯定了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面临一个明显的问题：由于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减弱，也由于美国力量有限，美国是否可以或应该减少在海外的义务和驻军，而又不致于损害美国希望参与的地区的稳定？

没有抽象的原则可以采用。很少有人相信苏联会在欧洲发动进攻，但很多人害怕失去理性的行动。减弱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可能使以色列的生存受到威胁，从东南亚或印度次大陆或南亚次大陆脱身就可能被认为是美国改变了政策。

欧洲的形势仍然是近期内最关键的问题。共产主义的崩溃结束了冷战，从而也削弱了苏联的实力。德国在走向统一，新的均势正在形成。美国仍然是重建欧洲安全的主要角色。但美国面临着两种相互冲突的压力。一方面，美国希望促成德国统一，同时又要建立起防止德国现在或十年内破坏欧洲均势的安全保障。这意味着要对德国施加限制或制约，并为德国的邻国包括苏联提供美国的保证。

另一方面，美国的政策又不能忽视苏联的力量在若干年后可能（即使不一定）重新壮大，对东欧及中欧再度构成威胁。这就需要一种双重保险的政策，包括一个强大的西方联盟和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也还需要一种能迅速形成的军事态势。这种态势又会影响到美国按军控协议裁减军备的程度。目前军控协议似乎不如五年前那么关系重大了，毕竟，军控协议的价值可能主要在于错综复杂的核查体制而不是核武器的实际裁减数量。

然而，在美国和欧洲出现和解的欣喜气氛中，要实现微妙的双重保险政策可能相当困难。美国需要的新政策方案，类似于杜鲁门在共产主义入侵朝鲜后不久批准的那种方案。当时那个文件（NSC—68）的优点，在于它把各种政策要素统统结合在遏制这个广泛的主题之下。

因此，不管如何重新审议美国的政策，最终都要回到冷战开始时候的情况。由于苏联的变化如此深远，美国也许是1917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发展一种全新的对苏关系。美国人很少想到希望从共产主义后的俄国得到些什么。这可不再是一个随便想想的问题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已到尽头，我们可能亲眼看到苏维埃帝



国也就是苏联本身的崩溃，但我们无法知道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比较宽松的邦联还是好斗的民族主义的俄国。

对此，我们能够或者应该做些什么？美国的利益又在哪儿？

## 六

人们常说，美国对它自己的世界作用需要有个新的“想象”。如果人们也接受常识，认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将越来越小，因而只好更加巧妙地行事，那么，需要新“想象”的说法就更有道理了。不过，去年的事态表明，常识大可怀疑。谁会在一年前想到，苏联领导人竟会提出废除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柏林墙被拆除，德国将统一，一位剧作家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去年并非是卖弄博学的年头。在美国开始重新考虑世界作用的当口，最好是作好思想准备，准备看到将会超出任何周密想象的意外事件。

最后，还应该提出一点警告。一位美国外交政策的精明观察家，已故的汉斯·摩根索警告过美国的政策不要有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倾向：“彻底的孤立主义和彻底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他认为，两个极端都“同外交政策的正确立场，即明辨、精审、慎处的中间立场是对立的”。

（劳河 译）